Academic Press of the USA Inc.
美國學術出版社

漢學 Sinology 4 (2021)

ISSN 2833-1516, Online 2833-1540 ISBN: 9781682025246
馬維行 (M. Woesler) 主編

歐洲大學出版社

漢學 Sinology 4 (2021)

《漢學》由世界漢學研究會(http://china-studies.com)於2018年創辦，收錄有關中國古代、近代、現代和當代大中華地區歷史、經濟、文化和社會文章、不定期論文、評論文章、書評等，以及其他中文期刊和專著的論文摘要。本期刊為歐盟和其他歐洲國家的學者提供了一個專門的學術交流論壇。我們歡迎各地學者(包括博士研究生)的來稿。

Hanxue / Sinology is a double blind peer reviewed annual journal in Chinese on traditional,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featuring research results from the Humanities including Social Sciences, Cultural Studies, Letters, Philosophy, History, Law, Economy etc. It offers a forum especially for scholars from sinophone countries, regions and communities. We welcome contributions based on independent research by scholars, including PhD candidates, from anywhere. Publisher: New Castle: Academic Press of the USA, Editor: Martin Woesler.

《漢學》文章經過專家審閱，每年出版一期。

期刊網站是：

http://universitypress.eu/en/journals.php.

本刊已加入以下引文索引： Publons、Index Copernicus、ROAD、Citefactor、Academic Research Index (ResearchBib)、Scientific Indexing Service 等

《漢學》是中國湖南師範大學外語學院的中文學術期刊。編輯部：湖南師大外院國際漢學中心。

出版社、印刷、發行：美國學術出版社，美國19801 特拉華州紐卡斯爾縣威爾明頓市 1007 N Orange St 4th floor suite #96, Wilmington, New Castle, Delaware 19801, USA.

美國：該雜志由美國學術出版社在美國印刷出版，可通過 ap@e-texts.org或亞馬遜網站直接從出版社購買。

歐洲：該期刊由歐洲大學出版社在歐洲印刷和出版，可以通過 info@universitypress.eu 或 Amazon.de 直接從出版社購買。

主編：吳漢汀

郵箱: journal@china-studies.com
ISSN 2833-1516, Online ISSN 2833-1540
ISBN 978-1-68202-524-6, ASIN

每篇文章都有 DOI, 例如：DOI:10.12906/9781682025246_00X, X 表示期刊的部分，比如 X 是 1 表示封面、版權頁、目錄，2 表示第一篇文章。3 表示第二篇文章，以此類推。訂購 order@china-studies.com

製作編輯：黃淵基，漢學編輯：朱立蓥

個人和機構訂閱費用（含國內外郵寄費）：

紙質版 49 歐元/年（不含特刊）

電子和紙質版 99 歐元/年（含特刊）

特刊 49 歐元/期

大學校內網入口許可 (IP 域名範圍)398 歐元

有關每期目錄信息，請參閱美國國會圖書館內記錄：

http://journal.china-studies.com

http://universitypress.eu/en/journals.php

來稿須知

請在 Microsoft Word 或 Open Office 中按照期刊的格式編寫論文，並提交至 journal@china-studies.com。

《漢學》期刊投稿文章格式詳述：

1. 字體和行距

文章應選用 A5 版面，頁邊距為上下左右各2cm。文章標題中文應採用 20 號加粗宋體，英文應採用 20 號 Times New Roman 加粗字體，中文英文標題分兩行寫出，並居中顯示，前後空一行；副標題中文應採用四號加粗宋體，英文應採用四號 Times New Roman 加粗字體，中文英文標題分兩行寫出，並居中顯示，前後空一行；作者名字，所在大學，所在國家或地區這一資訊應採用五號宋體，並居中顯示。

文章摘要部分："摘要"二字應採用五號加粗宋體，左對齊，摘要內容應採用五號宋體，寫在"摘要："二字下一行，中文摘要需 300 字左右。英文摘要中，"Abstract" 這一單詞應採用五號 Times New Roman 加粗字體，左對齊，英文摘要內容應採用五號 Times New Roman 字體，寫在"Abstract:"下一行，英文摘要需 250 詞左右。

正文部分：一級標題應採用四號加粗宋體，二級標題應採用小四號加粗宋體，上方空一行，三級標題應採用小四號宋體，其他正文內容中，中文應採用小四號宋體，英文應採用小四號 Times New Roman 字體，首行縮進 2 字符，行距統一為：多倍行距 1.2 倍。註腳部分：中文應採用五號宋體，英文應採用五號 Times New Roman 字體。

2. 文中引文以及註腳

當正文中出現長引文時，應單獨引用，採用五號楷體，前後空出一段，每行縮進 4 字符。在引文最後應當用括弧標明作者名字，年份及頁碼，不同項間用英文逗號以及英文空格銜接。

請將作者相關研究方向，聯繫方式，是否為基金專案論文等資訊作為註腳於封面頁標明，如論文為基金專案下論文，請按照"基金專案：專案名稱或編號"格式在註腳寫明，註腳部分只需要注明需要解釋的信息，無需將參考文獻添加在註腳部分。

3.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四字應另起一頁，採用四號宋體，左對齊顯示，文獻按照英文首字母或拼音首字母排序，書籍以及期刊名應用斜體表示。參考文獻第一行左對齊，第二行應首字縮進 2 字符。

引用文獻為**書籍**應採用的格式：

姓名 Pinyin, 姓名 Pinyin. 年份. *書籍名* [英文翻譯]. 出版地[英文翻譯]：出版社[英文翻譯].

英文的書籍：

Last name, first name, and first name last name. Year. *Book Title* [中文翻譯]. Place[中文翻譯]: Publishing House[中文翻譯].

引用文獻為**期刊**應採用的格式：

姓名 Pinyin, 姓名 Pinyin. 年份. 文章名稱[英文翻譯]. *期刊名稱*[英文翻譯] 期數(卷數):頁碼（注：如無期數，則採用 卷數:頁碼的格式）

英文的期刊：

Last name, first name, and first name last name. Year. Paper Title [中文翻譯]. *Journal title* [中文翻譯] 期數(卷數):頁碼（注：如無期數，則採用 卷數:頁碼的格式）

倫理聲明

《倫理聲明》基於國際出版倫理委員會(COPE)於 2011 年起草的建議。

編輯義務

1. 中立。文章內容與作者的種族、性別、性取向、年齡、殘疾、宗教、民族、政治哲學無關。
2. 保密。所有手稿都應被視為機密文件。未經編輯允許，不得將它們展示給任何人。除了作者、審稿人之外，管理人員和編輯人員不應向任何人透露提交的稿件信息。
3. 資料披露及利益衝突。未經作者明確同意，編輯或審稿人不得在自己的研究中使用所提交稿件中未發表的數據。
4. 發表決定權。期刊編輯決定投稿文章的發表。編輯在編輯委員會政策的指導下，考慮有關誹謗、版權和剽竊的法律義務。編輯可以與編輯委員會的其他成員或審稿人共同做出決定。如果作者對委員會的決定有異議，編輯可以邀請兩位新的審稿人。

審稿人義務

1. 編輯權。審稿人協助編輯人員做出決定，也可能幫助作者提高稿件質量。
2. 延期和最後期限。當一名客座審稿人覺得自己沒有足夠的能力來評估文稿中提出的研究，或者如果他發現自己無法及時提供報告，必須立即通知編輯，以便預留時間聯繫其他審稿人。
3. 客觀、禮貌和尊重的標準。報告必須客觀。不允許針對作者的個人評論和批評或針對文本內容的傷害性言論。審稿人的觀點必須清晰，論據充分，並且尊重作者。
4. 引用文獻。審稿人必須找出作者未引用的出版物。任何此類表示都必須附有適當的評論。審稿人應提請編輯注意手稿和以前發表的數據之間的任何相似性和重疊。
5. 資料披露及利益衝突。通過匿名回復獲得的信息和想法是機密的，不應用於審稿人的個人利益。審稿人不應接受可能導致與作者產生競爭、合作或其他關係的利益衝突的稿件。

作者的義務

1. 信息的有效性。在提交出版的文章中包含的信息必須提出作者的研究結果，以及這些結果及其重要性的客觀討論。基礎數據必須正確顯示。欺詐性和故意不准確的信息是不道德且不可接受的。作者應該引用對研究有影響的出版物。
2. 創意和剽竊。作者必須確保所寫的是自己完全原創的研究，如果他們使用了其他人的書或文章，必須適當地標記出引用出處。
3. 一稿多投。作者不應向多個期刊(或書籍)提交同一篇稿件。在多個期刊上提交同一篇稿件是不道德且不可接受的。本雜志不接受除中文以外的其他語言發表的文章。在這種情況下，作者必須提供第一次出版的參考資料，並且不受原出版商的版權限制。
4. 文章作者。只有對相關研究做出重大貢獻的作者才被認為是作者。所有對研究做出貢獻的人必須出現在作者名單中。如果其他人參與了這個研究項目的某些方面，他們應在致謝中提到。第一作者必須確保所有合作作者(且只有合作作者)都包含在稿件作者名單中，合作作者已經看到並批准稿件的最終版本，且同意提交稿件。
5. 資料披露及利益衝突。所有作者如果有基金支持，必須標明。
6. 出版中的錯誤。如果作者在其出版物中發現了一個重要的錯誤或不准確之處，必須迅速通知編輯。

漢學 4(2021)1-6 ISSN 2833-1516 Sinology
DOI:10.12906/9781682025246_001

《漢學》第四卷（2021）
典籍 Classics

内容目錄 Contents

《孔丛子·诘墨》成篇问题刍议————伍亭因 7
Discussion on the Composition of Kongcongzi: Jiemo (Kongcongzi Criticizing Mozi). Wu Tingyin DOI:10.12906/9781682025246_002

敦煌写本《新修本草》残卷研究————王国巍 35
Study on the Fragments of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Newly Revised Materia Medica”. Wang Guowei.
DOI:10.12906/9781682025246_003

南人北学陆陇其————梁世和 51
Lu Longqi - A Southerner Who Studied the Northern Tradition. Liang Shihe. DOI:10.12906/9781682025246_004

《勵忠節鈔》引《世說新語》考論————黃啟深 75
A Study of *Shishuo Xinyu* with Reference to *Lizhongjiechao*.
Huang Qishen. DOI:10.12906/9781682025246_005

唐大中初年道教瑞应与国家政治的互动 —— 以唐大中二年饶州开元观神秘移址事件为例————周能俊 107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aoist Divination and 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Early Dazhong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 —— The Example of the Mysterious Relocation of Kaiyuanguan in Raozhou in the Dazhong Second Year of Tang Dynasty. Zhou Nengjun. DOI:10.12906/9781682025246_006

漢學 4(2021)53-76 ISSN 2833-1516 Sinology
DOI:10.12906/9781682025246_005

南人北学陆陇其

Lu Longqi - A Southerner Who Studied the Northern Tradition

梁世和，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
Liang Shihe, Hebe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ina

Abstract
The Northern and the Southern scholarly traditions have been different since ancient times, since the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Confucianism was confronted with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and then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different academic traditions in the North and South. Lu Longqi was from Pinghu, province Zhejiang, but his reverence for the truth and his discouragement of falsehood, the promotion of practical academic interest is quite close to the Northern tradition. The customs of the North are very compatible with several of his important writings and were also completed in the North.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people of the North is outstanding. Lu Longqi said, he “studied the lower part and honored the upper part” of Confucius, he emphasized that "the

upper part can be seen in the lower part". For the learning of Zhu Xi, he spared no effort to exclude Lu Wang. Because of his strong sectarian view and resilience, he lacked creativity in his thinking.

Keywords
Lu Longqi, Northern scholarly tradition, learning the lower part, honoring the upper part

摘要
南北学术风尚自古不同，自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经学就有北学、南学的对峙，后来逐渐发展成南北地域不同的学术传统。陆陇其是浙江平湖人，但其崇实黜虚、推崇实学的学术旨趣颇近于北学，与北地风俗非常契合，其几部重要著述也是在北地完成。在北地为官期间，他对教化士民、化民成俗贡献卓著。陆陇其对孔子“下学上达”阐发颇多，强调“上达即在下学中”，为学专宗朱熹，排斥陆王不遗余力。因其强烈的门户之见及重在践履，在思想上则缺乏创见。

关键词
陆陇其 北学 下学上达

南北学术风尚自古不同，孔子亦有北方之强与南方之强差别的说法，由此形成南北地域不同的学术传统。在同一个文化区域内，有相近的学风和旨趣。但并非北人学问一定是遵从北学学术旨趣，南人也并非一定是南学风尚，陆陇其就是这样。

一

陆陇其（1630-1692），字稼书，浙江平湖人，但其学术旨趣颇近于北学，因此他在北地为官期间，与当地风俗很能契合。康熙二十二年（1683）十二月任直隶灵寿知县，康熙二十九年（1690）调任京官，后任四川道监察御史。陆陇其在直隶为官 7 年政绩卓著，兴修水利，奖励农垦，减免赋税，洁己爱民，被誉为“天下第一清廉”。期间，他与百姓讲论而作《六论集解》，定期赴书院与诸生讲论《四书》，其讲稿就是后来著名的《松阳讲义》。时人撰述陆陇其《行状》载：“先生在灵寿时，率五日一至学宫，集诸生，讲《四子书》，谆谆于义理邪正之辨，汇为《松阳讲义》百余篇。”[25]康熙二十五年（1686）修撰《灵寿县志》告成。此志三易其稿，是清代名志之一，是方志的典范。第二年他又撰成《卫滨日钞》，即后来的《松阳钞存》。《松阳讲义》《灵寿县志》《松阳钞存》是陆陇其在灵寿时期的主要著述，也是其思想成熟期的重要代表作。尤其是陆陇其在政事之余勤于讲学，对教化灵寿士民、化民成俗贡献卓著。

陆陇其从灵寿离任时，他的行李只有图书和妻子的织机，成千上万民众执香携酒，号哭“还我父母”，可见其民众之爱戴、挽留之情。时人有诗赞曰：“有官贫过无官日，去任荣于到任时。”左都御史魏象枢应诏举清廉官，疏荐陆陇其洁己爱民，《清史稿》称其“廉能清正，民爱之如父母”。陆陇其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去世，后被追谥为“清献”，

[25] 陆陇其：《陆陇其集》，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91 页。

“本朝理学儒臣第一”，为清代从祀孔庙第一人。

陆陇其专宗朱熹，排斥陆王不遗余力。刁包亦尊程朱抑陆王，二人可谓志同道合。陆陇其对刁包非常赞赏，在其《松阳讲义》中常引用刁包之言，并作《刁文孝先生生平事实记》以示纪念。其文曰：

> 余不佞，承乏江南时，与东林过从。知祁州有刁蒙吉先生者介节士也。而徵君尤称以有道著闻，盖景慕久之，恨未得读其书。顷至桓阳，见《用六集》，稍慰饥渴之思。终以未得全集为恨。岁己巳二月，走尺素敬求诸书，并求先生行实。先生长子再濂，喜求教之诚，尽出遗书，复惠先生行述一卷，得展拜而读之，欣然有当于中沉潜反覆。阅数月卒，业喟然叹曰：孔孟而后，百家争鸣。唯程朱为圣学正派。先生此书，又程朱正派也。发明圣学，接引后进，直为万世入道津梁。……幸得先生全集，于鄙意每相吻合，朝夕咀嚼。……此予之所尝服膺于先生者，一如先生之于梁溪也。余不揣更有进焉。先生隐居潜室，闭户二十余年，所学由高、顾、罗、薛而上溯程朱得孔孟嫡派，盖醇乎其醇也，非所谓濂洛关闽之后身欤？[26]

刁包和陆陇其都极为尊崇朱熹。刁包说：“吾道有三纵，

[26] 陆陇其：《刁文孝先生生平事实记》，刁包《用六集·附录》，道光癸卯年，顺积楼藏版。

尧舜时如日始旦，一纵也；孔孟时如日中天，二纵也；程朱时如日重明，三纵也。凡此三民，学道者不可不知。”[27]又说：“欲为儒宗者，宗朱而已矣，宗朱所以宗孔也；锐意宗孔而不宗朱，非真能宗孔者也。”[28]刁包认为儒学有三大高峰，一是尧舜，一是孔孟，一是程朱。他将朱熹比为孔子，认为宗朱即是宗孔，而仅仅宗孔而不宗朱，非是真的宗孔，可见朱熹在其心目中的地位。刁包于近人最佩服高攀龙，他主张为学路径由高攀龙上溯朱熹，由朱熹达孔子。他说：“今之学道者，须自梁溪登考亭，自考亭登尼山，才不差却路径。”[29]高攀龙认为：“自良知之教兴，世之弁髦朱学也久矣。一人倡之，千万人从之，易也；千万人违之，一人挽之，岂易易哉！此所谓不惑者也，能返其本者也。”[30]王阳明致良知之学兴起，世上鄙视朱熹之学久矣。现在要做的就是返“本”，即回到朱学。他强调：“夫学者，学孔子而已。孔子之教四，曰文、行、忠、信。惟朱子之学得其宗，传之万世无弊。”[31]

---

[27] 刁包：《潜室札记》卷下，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六月，第 43 页。

[28] 刁包：《潜室札记》卷上，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六月，第 6 页。

[29] 刁包：《潜室札记》卷上，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六月，第 1 页。

[30] 高攀龙：《崇文会语序》，《高攀龙全集》（上），凤凰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568 页。

[31] 高攀龙：《崇文会语序》，《高攀龙全集》（上），凤凰出版社 2020

刁包非常尊崇近人高攀龙，陆陇其曰：“予之所尝服膺于先生（刁包）者，一如先生之于梁溪也。”。意思是说，我之信奉刁包，好比他信奉高攀龙。这基本上是客套话，实际上陆陇其最推崇佩服的是同辈人吕留良（1629-1683）。吕留良只比陆陇其大一岁，但正是受吕留良影响，陆陇其才笃信朱熹之学。康熙十一年（1672）陆陇其到嘉兴拜会吕留良，称“始遇先生（吕留良），从容指示，我志始坚，不可复变”[32]“益信吾道不孤，心理本同，不可别立宗旨厚诬天下也”[33]。

陆陇其痛诋王阳明及其后学曰：“明之中叶，自阳明王氏倡良知之说，以禅之实而托儒之名，龙溪、心斋、海门之徒从而衍之，王氏之学遍天下，几以为圣人复起，而古先圣贤下学上达遗法灭裂无疑，学术坏而风俗随之，其弊也，至于荡轶礼法，蔑视伦常，天下之人恣睢横肆，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外，而百病交作。……故愚以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34] 王学破坏了儒学“下学上达”之法，而学术破坏导致风俗大坏，致使天下人肆意妄为，社会百病丛生。而要挽救这一切，唯有返回朱学。陆陇其认为，明中叶王学大行其道是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明清之际学

年版，第 568 页。

[32] 吴光酉等，《陆陇其年谱》，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95 页。

[33] 吴光酉等，《陆陇其年谱》，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95 页。

[34] 陆陇其：《陆陇其集》，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5 页。

者对于明亡的反思，普遍认为晚明王学的空谈心性、脱离实际是主要原因，因而形成“由王返朱”学术思潮。当然这与清初统治者选择朱学作为意识形态统治工具，确立朱熹学说为官方哲学有很大关系。但刁包与陆陇其都是纯粹的学者，对朱学是发自内心的认可，并非仅是统治者提倡使然。

二

《论语·宪问》篇有一处孔子与子贡的重要对话。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这里孔子提出一个重要命题“下学而上达”。

孔子认为人的生命境界是个不断提升的过程，其路径和方法是“下学而上达”。孔安国释为“下学人事，上知天命”，皇侃疏曰：“下学，学人事。上达，达天命。我既学人事，人事有否有泰，故不尤人；上达天命，天命有穷有通，故我不怨天也。”[35]。二人对“下学”与“上达”的阐释基本是一致的。清代学者黄式三则特别指出孔子的“下学”，他称：“下学，删订赞修之事。上达，所学通于天也。圣人删订赞修，惓惓斯道之心，上通于天，而天自知之。”[36]具体所言孔子的“下学”便是“删订赞修之事”。

---

[35] 程树德：《论语集释》（三），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1020 页。
[36] 转引自高尚榘主编，《论语歧解辑录》（下），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785 页。

关于“上达”，经典阐发尤多。刘向《说苑·至公》篇载：“夫子行说七十诸侯，无定处，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人事浹，王道备，精和圣制，上通于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于是喟然而叹曰：‘天以至明为不可蔽乎？日何为而食也？地以至安为不可危乎？地何为而动？’天地尚有动蔽，是故贤圣说于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灾异并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这里刘向对“上达”之意又有进一步的解释，在他看来，“上达”就是“上通于天”，就是天知孔子。何晏注曰：“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故曰惟天知己。”[37]王充《论衡·指瑞篇》称“以为天以麟命孔子，孔子不王之圣也”，天以仁兽麒麟来启示孔子为“不王之圣”，此即所谓刘向“上通于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刘宝楠《论语正义》也认为孔子与子贡对话中对的兴叹，是因鲁哀公“西狩获麟”之事而发。他说：

“下学上达”，为作《春秋》之旨。学通于天，故惟天知之。《论语撰考谶》云：“下学上达，知我者其天乎，通精曜也。”与《说苑》意同。盖《春秋》本天治人，包说夫子上达于佐国理民之道，即是上通于天也。《汉书五行志》：“刘向以为如人君下学而上达，灾消而福与矣。”颜师古《注》：“上达，谓通于天道而畏威。”此虽譬引之辞，然亦

[37] 程树德：《论语集释》（三），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1020 页。

谓人君精诚格天，则自降之福。是上达为上通于天也。[38]

刘宝楠引多部经典并结合己意，认为所谓“上达”即“上通于天”。孔子的生命境界每十年有一个飞跃，自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就此六个阶段而论，其“志于学”、“而立”、“不惑”属于学人事的“下学”阶段，“知天命”、“耳顺”、“不逾矩”则属于达天命的“上达”阶段。

关于“下学”与“上达”两者的关系，朱熹《论语集注》对孔子与子贡的对话阐发说：“不得于天而不怨天，不合于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学而自然上达。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渐进耳，无以甚异于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语意，则见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独知之之妙。”朱熹认为，“下学上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待“反己自修”到一定程度，“下学而自然上达”。张居正《论语直解》对朱熹的说法有很好的诠释，他说：“只是循序自修，如义理有本末粗精，我只是在下面这一层着实用功，使功深力到，将上面这一层渐次通达。”[39]朱熹引程子曰：“学者须守下学上达之语，乃学之要。盖凡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然习而不察，则亦不能以上达矣。”（朱熹《论语集注》）程子所谓“凡下

[38] 程树德：《论语集释》（三），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1020 页。
[39] 转引自高尚榘主编，《论语歧解辑录》（下），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785 页。

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与朱子循序渐进的说法是一致的，但程子提出如果习而不察，则不能以上达。

陆陇其《松阳讲义》承袭程朱，对“下学上达”发挥颇多。他说：

学者读这章书，须知圣人只是这“下学”，一部《五经》《四书》都是说“下学”，若不从“下学”入手，纵智勇绝世，却是门外汉。[40]

只管“下学”,自然“上达”，不是“下学”外别有个“上达”；又不是“下学”中便有“上达”，是“下学”熟便能“上达”。“志学、而立、不惑”是下学,“知天命、耳顺、从心”便是上达。方其“下学”，固皆平常目用之事,及其“上达”,亦只是“下学”之熟，并无一毫奇异，此个光景，只是夫子自知默与理契而已。[41]

这章书即孔子与子贡的对话，陆陇其认为“下学上达”只是“下学”而已，“下学”工夫醇熟便能“上达”，不存在另外一个“上达”工夫。同时期另一位宗程朱的理学家朱用纯（柏庐）在其《毋欺录》中说：“下学而上达，上达即在下学中，所以圣贤立教，只就下学说，才以上达立教，便误后学，便是害道病根。”[42]朱柏庐的看法与陆陇其完全一致，

[40] 陆陇其：《松阳讲义》，华夏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61 页。

[41] 陆陇其：《松阳讲义》，华夏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60 页。

[42] 程树德：《论语集释》（三），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1020 页。

而且对“下学”与“上达”的关系说得更加明确，“上达即在下学中”，用“上达”立教便是害人。圣人一生只做得“下学”工夫，所以一切尽在下学中。“然不曾打破得‘怨尤’一关，亦不能‘下学’。此一关最难，无论他人，即屈原行吟泽畔，只做得‘怨尤’，不曾做得‘下学’，须先将自家胸中怨尤病根尽情斩去，不留丝毫，方能‘下学’。”[43]“下学”必须打破“怨尤”一关，做到“不怨天、不尤人”，但这一关很难过，即使屈原亦是“怨天尤人”。如何斩断“怨尤”的病根呢？陆陇其特别指出“不怨尤”的着手处，他说：

“下学”须从“不怨尤”始。吾人一开口，一举念，便涉怨尤，如何能下学？犹之“敏事慎言”,必先言“无求安饱”,君子“素其位而行”，必先言“不愿乎其外”也。下学即是《大学》之“三纲领八条目”,《中庸》之“尊德性，道问学”,《论语》之“博文约礼”“愤忘食”“乐忘优”。[44]

“下学”首先要从不怨天不尤人开始，如何才能不怨天不尤人呢？具体言之，陆陇其举《论语·学而》“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中庸》所谓“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为例，强调先从最基本的要求做起。统而言之,《大学》之“三纲领八条目”,《中庸》之“尊德性，道问学”,《论语》之“博文约礼”“愤忘食”“乐忘优”都是“下

[43] 陆陇其：《松阳讲义》，华夏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61 页。
[44] 陆陇其：《松阳讲义》，华夏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60 页。

学”。

关于“下学”如何“上达”，陆陇其总结了诸家主要观点：

《注》以“循序渐进”解“下学、上达”，《蒙引》主“积久”说，是由卑而高，由近而远，以渐而进，到知行之极处，是为“上达”。《存疑》主“逐节”说，则学一件事，便知一件理，学与达只在时，上与下只在一处。《存疑》是泥于程《注》“下学人事便是上天理”之言。《蒙引》云：“程子说忒紧了，程子只恐人认‘上达’在‘下学’外，故云尔。”按：《蒙引》最是，然其实程子亦是主“积久”说。所谓“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者，言初间只管下学，到后来便上达，并无别样工夫，不是谓一“下学”便“上达”也。其以人事、天理分上下者，初间非离天理也，但只见人事，到后来神明默成时，非离人事也，但只见天理。[45]

陆陇其这里总结了三种主要说法：一是朱熹《四书集注》的“循序渐进”说；二是蔡清《四书蒙引》的“积久”说；三是林希元《四书存疑》的“逐节”说。对这三种观点，陆陇其非常赞赏《四书蒙引》的“积久”说，并认为程子所谓“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也是“积久”之意。

以陆陇其为代表的程朱学者极为重视“下学”，强调“上达即在下学中”，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对“下学上达”亦有自己的看法。王阳明对弟子陆澄的发问有一段回答：

[45] 陆陇其：《松阳讲义》，华夏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61 页。

问“上达”工夫。先生曰：“后儒教人，才涉精微，便谓‘上达’，未当学，且说‘下学’。是分‘下学’‘上达’为二也。夫目可得见，耳可得闻，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学也；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达’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学’也；至于日夜之所息，条达畅茂，乃是‘上达’。人安能预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语者皆‘下学’，‘上达’只在‘下学’里。凡圣人所说，虽极精微，俱是‘下学’。学者只从‘下学’里用功，自然‘上达’去，不必别寻个‘上达’的工夫。”[46]

这里，王阳明批评“后儒”将“下学”与“上达”分为二，其所谓“后儒”当是指程朱，但显然他是误解了程朱，在“重下学”这一点上，王阳明与程朱其实是一致的。[47]王阳明指出可见、可闻、可言、可思者，为“下学”，不可见、不可闻、不可言、不可思者，为“上达”。这是王阳明与程朱学者的不同，王阳明的“上达”概念，不是具体指向天理，而是指抽象的观念。清代学者章学诚则把“下学”与“上达”的解释，更加抽象化，称“下学上达”为“盖言学于形下之器，

[46] 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台湾学生书局 1983 年版，第 62-63 页。

[47] 陈荣捷说：“盖程朱之教，重下学也。此与阳明之旨相同。阳明并非评其先上达而后下学。阳明误以其分下学上达为二而评之耳。”（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台湾学生书局 1983 年版，第 63 页）

而自达于形上之道也”[48]。其中，“下学”是“学于形下之器”；“上达”便是“达于形上之道”。他以传统的“器”和“道”观念来对应“下学”与“上达”。在他看来，“形下之器”是政教典章、人伦日用的可见之物；“形上之道”则为万事万物之所以然的不可见之物。由此可见，章学诚与王阳明在此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日本学者东条弘沿着二人的思路，更加彻底否认了上达的“天命”“天理”意涵，称：“下学卑近之事，而上达高远之事也。朱子曰：‘反己自修，循序渐进。’是也。孔安国曰：‘下学人事，上达天命。’非也。程子改‘上知天命’为‘上达天理’，益非。”[49]他所表达的是，“下学上达”无非是由“卑近之事”向“高远之事”的循序渐进，而无论是孔安国的“上达天命”，还是程子的“上达天理”都不对。虽然在“下学”与“上达”的内涵上，各有各的说法，但强调“下学”“上达”一体，程朱、王阳明、章学诚的说法是一样的。程朱讲“上达即在下学中”，阳明说‘上达’只在‘下学’里，章学诚则说“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50]，应即器以求道，由下学而上达，不可离“下学”而求“上达”，正如不可离“器”而言“道”。

自孔子以降，“上达”的意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孔子所谓“知我者其天乎”“五十知天命”，毫无疑问其“上达”

[48]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上），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147 页。

[49] 转引自高尚榘主编，《论语歧解辑录》（下），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785 页。

[50]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上），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132 页。

是“上通于天”，达于天命。孟子所谓尽心、知性、知天，《中庸》所谓“尽其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其目标亦是上达于天。从孔孟、汉代乃至唐代儒学仍是以“天”“天命”为“上达”目标。唐之后的宋明理学受佛学思辨性和心性化的影响，吸收佛、道思想构建内在形上本体，以“理”取代“天”成为儒学的核心概念。如此一来，“上达”的祈向由“上通于天”变为“上达天理”，外在超越的“天”成为内在的“理”，遮蔽、消弥了上达超越、终极关怀的一面。章学诚以“形上之道”取代“天理”，虽保留了上达的形上意蕴，却完全取消了“天理”所仅有的一点外在超越特征。由上可知，“上达”基本包含了三种解释：一是“上通于天”，以孔孟至汉唐儒学为代表；二是“上达天理”，以程朱理学为代表；三是“达于形上之道”，以阳明心学、章学诚为代表。

虽然各家各派对“下学”与“上达”内涵的理解多有不同[51]，但几乎都肯定“下学”是“上达”的基础，反对有“上达”工夫，如朱熹所谓“知下学而自然上达”，陆陇其“只管下学，自然上达”，朱柏庐“上达即在下学中”，王阳明“上达只在下学里”等。今人钱穆对此的阐发尤为详尽，他说：

本章重在“下学”两字。一部《论语》，皆言下学。能下学，自能上达。无怨无尤，亦下学，然即已是上达之征。

[51] 陆陇其认为王学之病在于脱离了下学上达，一味追求上达，从而导致空疏无用，实际上王阳明同样主张下学上达，并特别强调“上达只在下学里”，问题在于二人所理解的“下学”“上达”涵义不同。

孔子反己自修，循序渐进，以致其知。知愈深而怨尤自去，循至于无人能知、惟天独知之一境。故圣人于人事能竭其忠，于天命能尽其信。圣人之学，自常人视之，若至高不可攀；然亦本十室之邑所必有之“忠信”而又“好学”以达此境。故下学实自忠信始。不忠不信以为学，终无逃于为小人之下达。至于舍下学而求上达，昧人事而亿天命，亦非孔门之学。[52]

钱穆强调“能下学，自能上达”，而“舍下学而求上达，昧人事而亿天命”，与“明心见性之流，各以其所顿悟者为上达之妙”[53]，即是程颢所批判的“唯务上达，而无下学”[54]的佛道学说，已背离了孔门之学。在这样一种普遍重视“下学”背景下，鼓吹“下学”的绝对性成了一种政治正确，凡说“上达”便是好高骛远。主张不要问上达工夫，要扎扎实实于下学，时候到了，自然能上达。这些观点背后的逻辑是认为“下学”“上达”一贯，“下学”为工夫，“上达”为境界，境界由工夫来达成。这里的问题在于，称“下学”“上达”一贯是没问题的，但不可将两者合一，以下学消融上达。“下学”与“上达”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两者都是提升生命认知的手段，互相促进，不可割裂，因而是“一”。但毕竟“下学”是“下学”，“上达”是“上达”，因而又是“二”。明代思想家李

[52] 钱穆：《论语新解》，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383 页。
[53] 程树德：《论语集释》（三），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1021 页。
[54] 程颢、程颐：《二程集》（上册），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139 页。

贽敏锐地发现了两者之间的悖论，称：“下学自是下学，上达自是上达，若即下学便以为上达，亦不可也。”[55]认为下学与上达是两件事，无法由下学而上达。所以“下学而上达”，从工夫与境界的角度来看，“下学”有“下学”的工夫和境界，“上达”有“上达”的工夫和境界，而“下学”又是“上达”的道德基础。

美国心理学家肯·威尔伯指出人的发展包括认知发展、情绪发展、人际关系发展、灵性发展等不同倾向的发展，每一种发展的倾向都要经过不同的阶段或意识波，这些不同的倾向乃是各自独立的：你可能在某一倾向上发展得很高，而在其它的倾向上却遭受到阻碍，譬如一个在灵修上发展得很高的人，也许在情感和关系上却是个低能儿。此外，虽然这些倾向是各自独立的发展，它们却必须经过相同的阶段或意识波的阶序，譬如它们都必须从前成规期进入成规期再进入后成规期。他特别强调：“我们虽然有各种不同的发展倾向，但这些倾向都必须通过相同的阶段或意识波的阶序。一个人确实有可能在某一个倾向上发展得很高，而其它方面却像个未开化的混球。”[56]

根据发展心理学的理论，理学家所说的“洒扫应对”等“下学”内容，属于认知发展、情绪发展、人际关系发展等方面的发展，而“上通于天”“上达天理”“达于形上之道”等

[55] 李贽：《焚书·续焚书》，岳麓书社 1990 年版，第 138 页。

[56] 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一味》，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48 页。

“上达”内容，则属于灵性发展的方面，而且是各自独立的发展。这就会出现，在洒扫应对等方面发展的很好，但在灵性方面却可能完全入不了门。反之，有些人可能在灵性上发展的很高，但在道德或人际关系上却表现的很糟糕。这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体验是一致的，正如肯·威尔伯所说，“我们都认识一些在冥想上很有进展却极不讨人喜欢的人”[57]。每种倾向各自独立发展，却必须经过相同的阶段或意识波的阶序，正好说明每种倾向都有各自的工夫和境界。荀子和孟子就是分别从下学和上达方面，各自丰富和发展了孔子的“下学上达”思想，但同时荀子也阻隔了上达的祈向，孟子则对下学有所忽略。因此，统合孟荀，回到“下学上达”之真义，是儒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

经世实学是燕赵学统的重要特征。燕赵学者承继了北学开创者荀子、董仲舒所奠定的崇实传统。孙奇逢为学主张躬行实践，经世宰物，《四库全书总目》说他“平生之学，主于实用”。颜元一承孙奇逢精神，建立起自己极具实践特征的实学的儒学。夏峰学派和颜李学派成为明清实学思潮的主要代表，经世实学遂为北学后人普遍推崇，如纪昀主张“以实心励实行，以实学求实用”[58]，崔述强调“切于日用，

[57] 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一味》，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48 页。

[58]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纪晓岚全集》第一卷，大象出版社

用之修身治国”[59]，张之洞提出“一切学术，……要其终也，归于有用”[60]等等。实学思想始终是北学主流。

陆陇其崇实黜虚、推崇实学的学术旨趣与燕赵学统非常契合。其一生著述甚丰，为学以居敬穷理为要，“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践其实”[61]，“一生造诣，务在躬行实践，守下学上达之旨，为慎独存诚之学”[62]。陆陇其批评王学空疏无用，提出“实行必由乎实学”的为学方法，主张学术必须致于实用。陆陇其在任直隶灵寿知县时，所编撰的《灵寿县志》充分体现了实学特质，《艺文志》收录标准，其中一条是“风云月露之篇无关地方利病者俱不载”[63]。又说：“《艺文志》，上自廊庙得失，下至闾阎疾苦，无所不录，惟叹老嗟贫，夸多斗靡，嘲风弄月之辞，则无取焉。”[64]在陆陇其看来，嘲风弄月之辞虽文辞华美，但无关地方利病，终是无用。他主张收录的著述主要有两类：“灵

2019 年版，第 359 页。

[59] 崔述：《崔东壁遗书・考信录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6 页。

[60] 张之洞：《创建尊经书院记》，《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武汉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69 页。

[61] 陆陇其：《陆陇其集》，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6 页。

[62] 陆陇其：《陆陇其集》，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5 页。

[63] 【同治】《灵寿县志・凡例》，《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 5》，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年版。

[64] 【同治】《灵寿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 5》，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77 页。

寿虽蕞尔，前人之著述有颇可采者，列为上下二卷。其上卷皆关一邑之利弊，下卷则邑人之言关系天下学术政事者也。”[65]一类是关于县邑治理的文章，二是关于政事学术的文章，而绝无关乎文学之文章。

陆陇其的为学风格与燕赵学风是非常一致的，但因其强烈的门户之见及重在践履，在思想上则缺乏创见。后世学者对陆陇其的评价颇有争议，但仍以近代以来两位学术大家的评论为深刻，一是梁启超，一是钱穆。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首先非常肯定陆陇其“人格极高洁，践履极笃实”，对其表达了相当的敬意。对其在思想学术上的贡献，则认为他“天分不高，性情又失之狷狭，或者也因王学末流猖狂太甚，有激而发，所以日以尊朱黜王为事。……稼书办事是肯认真肯用力的，但能力真平常。”“他是要把朱子做成思想界的专制君主，凡和朱学稍持异同的都认为叛逆。”[66]

梁启超还特别引述了一段李塨记载陆陇其的轶事，曰：“陆稼书任灵寿，邵子昆[67]任清苑，并有清名，而稼书以子昆宗陆王，遂不相合，刊张武承所著《王学质疑》相诟厉。

---

[65] 【同治】《灵寿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 5》，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40 页。

[66]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24 页。

[67] 邵嗣尧，字子昆，山西猗氏人。历任山东临淄、直隶柏乡、清苑知县，有惠政。以清廉慈惠，擢御史。出为直隶守道，以清介闻。后任江南学政。

及征嗄尔旦[68]，抚院将命稼书运饷塞外。稼书不知所措，使人问计子昆。子昆答书云：‘些须小事，便尔张皇，若遇宸濠大变，何以处之？速将《王学质疑》付之丙丁，则仆之荒计出矣。’”[69]陆陇其与邵嗣尧同在直隶为官，陆陇其为学宗朱子，邵嗣尧为学宗陆王，因此，二人不合。陆陇其刊印张烈的著作《王学质疑》，藉此批评邵嗣尧。后来清军出兵征讨葛尔丹叛乱，抚院将命陆陇其向塞外运饷，陆陇其不知所措，让人向邵嗣尧问计。邵嗣尧作书答复说：这点儿小事就张皇失措，若遇上朱宸濠叛乱那样的大事怎么办？并借机讥讽陆陇其说，赶紧把《王学质疑》用火烧了，我的大计就出来了。梁启超引证此事，称对于陆陇其的评价，这种小事，也是该参考的资料，可见其对陆陇其的办大事的能力是很不信任的。值得一提的是，陆陇其清贫廉洁，谢世之日，竟无以治丧，有赖当时已任江南学政的邵嗣尧出俸余百金，为之营葬。二人虽为学宗旨对立，但对彼此的人格还是都很认可的。

钱穆先生对朱子非常推崇，认为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只有朱子堪与孔子并提。但钱穆对被四库馆臣称为“一以朱子为宗，在近儒中最称醇正”，以朱子之是非为是非的陆陇其却并不怎么认可。他说：“其实稼书于朱学，仅为一种四书之学而止。朱子生平学问，用力四书最深。其指示后学，

[68] 现译为葛尔丹。

[69]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24 页。

亦必先四书，谓五经为可后，诸史百家自当更次。治朱学而特研四书，固不为非。特当以四书为主，从而求之则可，非谓逐字逐句读四书，即为尽学问之能事也。徒解字义，在汉儒为章句，在明儒为讲章，显非朱子之学。稼书亦只是明末讲章家言，又乌得为朱子之正传？”[70]钱穆认为陆陇其的朱子之学，仅是一种四书之学，而且是一种徒解字义的“讲章家言”，毫无创见可言，根本算不上朱子正传。随后，钱穆对陆陇其开始了彻底的清算。他说：

稼书尊朱，其意虽笃，然果如其言，则人人可趋于不学，而朱子之所以为精且大者，亦将随以俱失。此则稼书一人之浅衷狭识，所以终无与于卫道之大任也。[71]

稼书为学，必一依朱子门墙，不能自树立。凡与朱子相异，则必加辩斥。然所辩斥，亦非能有深见。[72]

辨古书真伪，更非稼书学力所及。于古文尚书则不敢疑，于古本《大学》则不敢信。冬烘浅陋如此，宁得为朱子之正脉？[73]

---

[70]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1980 年版，第 117 页。

[71]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1980 年版，第 124 页。

[72]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1980 年版，第 125 页。

[73]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1980 年版，第 128 页。

余读稼书书，每感其尽是架空立说，未见着落处，殆因其无真知实见也。[74]

稼书论学，实是强不知以为知，徒在在字面上掉弄，在朱子则必斥此曰花言，谓如今世举子弄笔端做文字者便是。稼书之所以不脱为一种举业讲章之学者亦正在此。骤视之，若无可非刺。深究之，则空洞无物。此乃理学中一乡愿，而依傍门户以自高。[75]

在钱穆看来，陆陇其“浅衷狭识”“冬烘浅陋”“架空立说”“无真知实见”“强不知以为知”“空洞无物”“理学中一乡愿”等等。钱穆对陆陇其的批评可谓极为严厉，几乎是彻底地否定。

由于清政府大力提倡程朱理学，负责编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四库馆臣，给予了陆陇其非常肯定的评价，称其“陇其覃思心性，墨守程、朱，其造诣之醇，诚近代儒林所罕见”（《读礼志疑》条），“陇其笃信朱子，所得于《四书》者尤深”（《四书讲义困勉录》条），“陇其之学，一以朱子为宗，在近儒中最称醇正”（《读朱随笔》条），“陇其传朱子之学，为国朝醇儒第一”（《三鱼堂賸言》）等等。

[74]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1980 年版，第 129 页。

[75]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1980 年版，第 134 页。